

分报告七

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体系逐步成型并形成了自身特色。与西方国家的稳定化政策相比,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目标更宽泛,计划性与行政干预色彩更浓,且更侧重于财政与产业政策。然而,上述特点恰也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宏观调控目标宽泛化使得调控效率下降;行政干预与产业政策的运用形成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对计划手段与财政政策的侧重弱化了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因此,未来宏观调控体系应简化调控目标以增加相机抉择的有效性,转向间接的调控方式,并强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运用。关键词:宏观调控 稳定化政策 经济周期性波动

一、引言

宏观调控是典型的中国化术语,但并非中国独创的概念。^① 西方国家称之为稳定化政策(Stabilization Policy)^②,是旨在降低短期经济波动严重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③使产出与就业尽可能接近其自然长期水平。当然,宏观调控与稳定化政策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仅“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还“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包括“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内的目标。^④

实施稳定化政策的意义在于市场经济运行中会受到来自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冲击,短期内这些冲击会把产出与就业推离自然水平而扰乱经济,政府应当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努力稳定经济。比如,美国《就业法案》规定“促进充分就业和生产……是联邦政府持续不变的职责与政策”。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与健全不仅满足了稳定经济增长的需要,更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支柱之一。^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因此,深刻认识当前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具有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尤为重要。

二、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历程

根据宏观调控体系目标与手段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年~1986年。这一时期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但中国需要构建宏观调控体系以取代计划经济下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逐步得到一致认同。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确立激发了投资热情,大量基建项目审批上马。由于

^① 根据一些文献如刘瑞(2006)、庞明川(2009)考证,宏观调控为中国化术语,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直接与之相对应的概念。

^② 当前学界对宏观调控的定义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如马洪(1993)认为,宏观调控完全等同于政府干预;黄伯平(2008)认为,宏观调控是一种针对经济异常波动的非常规经济管理活动。本文将宏观调控定位于应对经济短期波动的政策手段,与西方稳定化政策定位相同。这与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许小年(2008)等文献一致。

^③ 名词解释来源于《宏观经济学(第七版)》,曼昆著。

^④ 参见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

^⑤ 参见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文。

经济长期处于供给短缺的状态之中,总需求扩张极易导致经济过热的出现。^① 由于经济管理体制依旧保留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政府只能依靠控制财政支出与信贷投放、叫停基建项目等行政性手段进行管控,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② 因此,在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上,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构建防止经济处于过热状态以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尤为关键。这是宏观调控理念在中国第一次提出。^③

第二阶段为1986~1997年。这一时期宏观调控体系以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重,较为有效地抑制了经济过热状态。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对过往向企业直接下达命令的方式给予否定。^④ 十四届三中全会则首次正式提出了构建宏观调控体系的任务,“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阐明了宏观调控的目标与方法,“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

在宏观调控实践中,经济手段在这一时期逐步得到重视,其与行政手段的配合有效应对了期间的通胀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基础。在“价格闯关”失败后的治理整顿期间,政府第一次有意识地搭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随后在应对邓小平“南巡”后的新一轮经济过热时(1992~1994)。^⑤ 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这些措施中既有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压缩财政赤字等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具有浓重行政色彩的信贷控制等直接干预措施。这也是政府首次采用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重的方式调控经济,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济运行在1996年

^① 1980年在商品与要素价格处于全面管制之下,CPI同比涨幅也已经达到了7.5%。1984年“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提出,再次导致经济出现投资与消费的“双膨胀”局面。1984、1985两年GDP增速达到15.4%、13.3%,1985年CPI同比涨幅飙升至9.3%。

^② 1978~1986年经济的大起大落特征十分明显,经济运行区间在5.1%~15.4%,CPI同比涨幅在0.7%~9.3%之间。其中,1981年在政府整顿治理经济过热状态后,CPI同比涨幅骤降至2.5%,GDP增速只有5.1%。

^③ 详细介绍“巴山轮”会议内容的文章,请参见《吴晓波: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巴山轮会议》等。

^④ 1987年中共十三大指出,“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同时,“过去的许多做法,如直接向企业下达过多的指令性指标,实行统购统销和供给制式的分配,有的是在建国初期国内国际环境中为加快奠定工业化基础而采取的,有的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的固定不变的东西,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改革就会成为发展生产率的障碍”。

^⑤ 期间GDP增速平均达到13.1%,CPI同比涨幅平均为15.1%,特别是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61.8%。

回归正常。

第三阶段为 1997~2014 年。这一时期宏观调控面对的经济形势更为复杂,更加注重以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与事前调节。1998 年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通缩危机,宏观调控不再仅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手段。党的十六大将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确定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① 自此之后,“加强与完善宏观调控”就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以及“降低能耗与保护环境”等也逐步被列入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中。

这一时期宏观调控体系的政策手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货币政策在调控方式上逐步形成了以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和基准利率构成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强化了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方式(周小川,2013)。此外,宏观调控突破以往事后调节的模式,吸纳西方国家稳定化政策的前瞻性特点,进行主动的宏观调控。2003~2007 年间面对经济运行出现过热迹象,宏观调控遵循“适度从紧”的原则对经济进行调节。2012 年以来,宏观调控运用适时适度的预调微调,保证经济增速的平稳波动。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在这一阶段中成功应对了 1998 年与 2008 年两次经济危机,尤其面对金融危机时,国务院迅速推出各部门相互协调配合的大规模刺激计划,短期内迅速拉动经济增速回升。可以看到,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在这一阶段中逐步成型,调控手段的运用更加成熟,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有效途径。

三、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特点

与西方国家稳定化政策相比,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在演变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特点,主要体现在目标、方式与政策工具三方面。

第一,中国宏观调控目标比西方国家稳定化政策目标的涵盖范围更加宽泛。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稳定化政策的目标是实现自然失业率与低通货膨胀率。在稳定化政策的实践运用中,各国之间还是有所差异。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作为稳定化政策的目标,采取“直接行动”方式进行相机抉择。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英国等国家均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在经济运行中将通货膨胀作为稳定化政策的首要调控目标。(米什金,2010)。

相比而言,中国作为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改革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承担着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任务。因此,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涵盖目标范围不局限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民生改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金融风险均纳入到了宏观调控目标之中。这也使得宏观调控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与要求,对主要调控目标

^① 详见 2000 年以来历年中央政府经济工作报告。

进行选择取舍。在金融危机以来,各年之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均不相同。2007年面对经济的过热状态,宏观调控目标定为“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下行压力,宏观调控目标转换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2010年通胀风险加剧,宏观调控又将“控通胀”列入主要目标之中,宏观调控目标为“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2012年为满足经济改革需要,宏观调控目标又扩充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2014年以来局部金融风险有所暴露,“控风险”也成为了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第二,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比西方国家稳定化政策更具有计划性与行政干预色彩。在西方国家的稳定化政策中,美英等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并不使用计划手段调控经济,更多的强调对宏观总量的间接调控。只有日、法、韩等少数政府主导色彩较浓的市场经济国家会出台一些发展规划(朱行巧,1999)。对中国来讲,宏观调控体系由于是从计划经济下的经济管制体制演化而来,承接了国家计划的调控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应“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①相应的在中央银行与财政部之外,作为计划经济下的核心管理部门,国家计委(现为国家发改委)是历次宏观调控的最重要部门。在计划手段的实施上,政府会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年度、五年以及十年规划,设定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中国宏观调控的行政干预力也是西方国家难以比拟的。这种行政干预能力不仅表现为国家发改委掌握着大量项目准入及相关资金划拨的审批权,更体现在如下三点。一是,国有银行垄断着银行业,强化了中央银行对资金价格、信贷规模以及信贷流向的控制,使货币政策更具有行政化色彩。二是,地方政府是中国高投资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关键因素(陈彦斌和郭豫媚,2014),能够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推动经济增长,保证财政政策迅速有效的落实。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中,国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并垄断着关键性与基础性行业,^②成为产业政策实施的重要“抓手”。宏观调控部门、国有银行、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构成的完整链条,使得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西方国家的稳定化政策以货币政策为主体,中国宏观调控则更侧重财政政策,并注重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一般地,货币政策处于对抗经济周期的前沿阵地”。^③这是基于货币主义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反思。上世纪60年代前凯恩斯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必须依靠财政政策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创造有效需求,货币政策对总需

^① 党的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了宏观调控中计划的重要性。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四大报告着重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等等。

^② 在关键性与基础性行业中,国有企业牢牢占据了如石油、电力、交通运输、军工等重要行业。

^③ 引自: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七版)》,P448。

求水平没有显著作用。^① 然而,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更为看重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论证了总需求水平与实际利率密切相关。^② 并且,利率传导渠道仅是货币政策众多传导途径之一,货币政策还包括资产价格途径与信用途径等,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影响。^③ 由此,西方国家重新重视对货币政策的运用,反而财政政策的运用因挤出效应、政府债务压力以及繁琐的政治程序等原因被逐步淡化。^④

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就是我国政府管控经济的核心手段,虽然货币政策的逐步完善承担了宏观调控的一些任务,但政府仍一直重视对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运用。整理近十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基调发现,货币政策大多以“稳健”作为主基调,只在2007年防止经济过热时转变为“从紧”,2008与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时转变为“适度宽松”。相比而言,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的逆向调节意图更为突出。在1998年、2002年以及2008年面对经济增长的放缓,政府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列为宏观调控的首要内容。^⑤ 同样,产业政策一直作为政府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而且涵盖范围越来越广、政策工具越发多样。尤其在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中,粮食安全与节能减排等产业目标被列为主要内容。同时,更多的产业政策手段纳入到宏观调控体系之中,如资源品价格管制、实行房价调控、收紧供地闸门以及化解产能过剩等(卢峰,2010)。

四、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存在的问题

虽然与西方稳定化政策相比,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具有自身特点。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上述特点恰使得当前宏观调控体系面临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宽泛化,导致调控效率下降。对于宏观调控目标而言,只有选择少量具有紧密相关性的重要经济指标,宏观调控政策才能通过相机抉择的方式使

① 这一观点是基于凯恩斯学派对大萧条时期数据的研究,发现经济衰退时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产出水平没有显著影响,私人投资与名义利率之间只存在弱相关性。

② 凯恩斯的研究只关注名义利率水平忽视了实际利率(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预期)。同样通过大萧条时期数据发现,投资水平与实际利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大萧条时期,之所以名义利率很低但却没有激发投资需求的根源在于,通货紧缩提高了实际利率,反而降低了投资需求。

③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分为三方面。一是传统利率的传导途径。二是资产价格传导途径,包含汇率水平、托宾q理论、财富效应。三是信用的传导途径,包含银行贷款途径、资产负债表途径、现金流途径、流动性途径以及意料之外的物价水平途径。详见米什金(2010)。

④ 事实上,在美国稳定化政策实践中,90年代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恰也能够使得美国经济迎来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经济繁荣(Yellen, 2001)。因此,积极甚至稳健财政政策并不是扩张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⑤ 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内容为“积极财政稳健货币”。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经济运行达到最优均衡水平(Giannoni&Woodford, 2012)。比如,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就是美国衡量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熟知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在稳定化政策的实践操作中,政策制定当局就可根据实际失业率与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之间清晰的比较,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①当然,著名的卢卡斯批判表明由于预期的存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易稳定存在。

中国宽泛化的宏观目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这也是近年来宏观调控目标在相机抉择中不断变化,但效果却始终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中,“稳增长”与“控物价”属于宏观总量范畴;“调结构”属于对微观经济的调控;“促改革”与“惠民生”则是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各个宏观调控目标的维度不同,互相之间自然无法形成显著的相关性。正因如此,即使运用相机抉择的方式,宏观调控也不能保证经济运行达到最优均衡状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金融危机以来,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在“稳增长”、“控通胀”以及“调结构”之间频繁切换。2007年宏观调控首要目标是“稳物价”。2008与2009年宏观调控目标是“保增长”。2010年宏观调控首要目标是“控通胀”。2012年宏观调控首要目标是“调结构”。2014年宏观调控首要目标是“稳增长”。然而近三年来,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周期性放缓的状态并未改善(陈彦斌,2015)。物价水平更多因经济较大的下行压力而处于低位。经济结构中消费率与第三产业占比的上升也主要是投资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幅度更大所致,消费增速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实际也处于下滑态势。

第二,宏观调控中行政干预与产业政策的使用,形成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如之前所述,行政干预的运用依靠着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国有银行、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构成的完整链条。同样,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也需要将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紧密串联。这样的宏观调控机制,就会面临委托—代理中典型的寻租问题。中央宏观调控部门作为委托人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包含相关部委)作为代理人具体实施政策手段。在分权的政治体制下,代理人(地方政府)与委托人(中央宏观调控部门)会进行利益博弈。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下,由于行政干预与产业政策所调控的均是投资项目的准入、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以及土地供应的审批等关键领域,企业作为寻租者就拥有激励与代理人进行寻租合谋,占有稀缺的资源或者规避调控。

一些学者对近年来房地产产业政策及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研究发现,委托—代理中的寻租问题确实存在,已成为产业政策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沈宏亮,2010;贺振华,2006)。吴敬琏(2009)更严厉的指出,假借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是计划经济的复辟,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损害经济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十八大后的反腐浪潮中,权力寻租的重灾区也就集中在电力、煤炭、能源等这些拥有项目审批权的部门。

^① 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指在通货膨胀没有上升时可持续的最低失业率。这是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详见Meyer(2004)。

第三,宏观调控侧重计划手段与财政政策手段,弱化了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逆向调节作用。计划性虽然是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特点,但将宏观调控纳入长期规划(如五年与十年规划)之中,其实是对经济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的本质区别没有认清。经济长期增长是由资本存量、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及人力资本等要素优化配置所实现。经济短期增长的波动称为周期性波动,主要由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变动所致。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稳定化政策还是中国的宏观调控都是以应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为目标。而中国的五年与十年的规划则属于经济长期增长,^①与宏观调控理论上并无关联。因此,宏观调控中包含长期规划的预期目标,会使其成为强化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工具,失去本身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意义。

同样,财政政策在实际中难以有效起到对短期经济的逆向调节作用。这既有中国特殊环境的影响,也有财政政策本身特性的因素。首先,中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动态不一致性,更多受到政治周期的影响,难以发挥对经济运行的逆周期作用。蒋伏心和林江(2010)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的锦标赛晋升机制及相应的政治周期变化导致财政政策呈现明显的顺周期变化。其次,中国“货币政策财政化”问题严重,理论上称为货币政策的财政效应。即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反而导致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更不稳定(Mishkin, 2002)。^②典型的例子为2008年金融危机时“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推出导致之后一段时期内物价水平显著波动。^③此外,财政政策本身的内在时滞较长^④,并受到政府债务的约束,使其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来应对经济短期波动。

五、结语

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调控效率的下降与逆周期调节作用的弱化正逐步制约宏观调控的发挥空间,权利寻租更是与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相悖。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宏观调控体系,也提出了“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的新要求,“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的新任务,制定了“科学的宏观调控”的新目标。

^① 虽然经济理论中没有明确经济周期的长短之分,但只要价格得到充分调整就可以称为长期。按此逻辑,中国五年以及更长的规划理应划为经济长期增长的规划。

^② 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始终是美联储所关注的问题。1985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告诉国会:“实际的潜在的预算赤字规模……加深了对我们控制货币供给和抑制通货膨胀能力的怀疑。”艾伦·格林斯潘也宣称:“美国长期的潜在赤字的大幅度减少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大降低通货膨胀预期。”

^③ 以“四万亿”刺激计划推行后,CPI同比涨幅由2009年2月份的一1.6%飙升至2011年7月的6.5%。

^④ 内在时滞是指经济冲击与应对该冲击的政策行动之间的时间。

本文认为未来宏观调控体系应分为目标、方式与政策工具三方面进行重构。一是简化宏观调控目标,提高相机抉择的有效性。宏观调控目标的最优调整方向应围绕着“经济增长、物价稳定、金融稳定”。^①实现“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目标重在政府构建长效机制去实现,宏观调控只能为其提供平稳的经济运行环境。二是全面转向间接调控,加速行政干预方式的退出。与西方国家的稳定化政策一样,中国宏观调控运行只是对市场经济在宏观层面局限性的补充,^②不应过度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机制的运行,反而更需要依靠市场机制达到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三是完善货币政策工具并健全宏观审慎框架,弱化财政政策手段与计划手段。西方稳定化政策实践表明,以货币政策为主体的宏观调控体系有能力保证经济平稳运行。^③宏观审慎政策则以防范系统性金融不稳定为目标,逆向调节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现象,与货币政策搭配协调运用。^④

^① 2008年金融危机后,学界认识到了金融机构是否稳健、金融生态好坏均是货币政策能够有效传导的关键,这要求宏观调控必须十分关注“金融稳定”这一目标(周小川,2013)。

^② 由于市场机制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以及滞后性特点,导致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难以避免,这是市场经济在宏观层面的局限性。

^③ 如之前所述,货币政策处于对抗经济周期的前沿阵地。当然,面临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危机时,政府肯定会倾其所能调用的经济政策挽救经济。这里本文所指的是一般性的宏观调控。

^④ 西方对于宏观审慎框架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后大范围展开,并一致认为在防范金融风险阶段,解决金融体系显著的顺周期问题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起到主导作用(Brunnermeier,2009;Caruana,2010)。

参考文献

- [1] N·格里高利·曼昆, 2011:《宏观经济学(第七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 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 2010:《货币金融学(第九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3] 周小川, 2013:《新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特点》,《中国金融》第2期。
- [4] 朱行巧, 1999:《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发展与比较》,《国外社会科学》第3期。
- [5] 卢锋, 2010:《中国宏观调控的内在困境》,《商务周刊》第14期。
- [6] 陈彦斌、郭豫媚, 2014:《高投资发展模式如何转变为适度投资发展模式》,《学习与探索》第8期。
- [7] 陈彦斌, 2015:《当前经济增速是周期性放缓还是潜在增速放缓》, 光明日报 2月4日。
- [8] 沈宏亮, 2010:《我国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失效及其治理研究》,《中南大学》。
- [9] 贺振华, 2006:《寻租、过度投资与地方保护》,《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
- [10] 吴敬琏, 2009:《宏观调控并不是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人民论坛》第7期。
- [11] 蒋伏心、林江, 2010:《晋升锦标赛、财政周期性与经济波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财贸经济》第7期。
- [12] 刘瑞, 2006:《宏观调控的定位、依据、主客体关系及法理基础》,《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5期。
- [13] 庞明川, 2009:《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理论创新》,《财经问题研究》第12期。
- [14] 马洪, 1993:《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发展出版社。
- [15]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2010:《后危机时期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研究》第10期。
- [16] 许小年, 2008:《为宏观调控正名》,《现代商业银行》第3期。
- [17] 黄伯平, 2008:《宏观调控的理论反思》,《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 [18] Janet L. Yellen, Alan S. Blinder, 2001, “The Fabulous Decade: Macroeconomic Lessons from the 1990s”. The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 [19] Giannoni, Marc P., Woodford, Michael, 2012, “Optimal Target Criteria for Stabilization Policy”. FRB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 No. 535.
- [20] Laurence H. Meyer, 2004, “A Term at the Fed: An Insider’s View”. Harpercollins Press.
- [21] Frederic S. Mishkin, 2002, “The Role of Output Stabilization in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9291.
- [22] Brunnermeier, M., 2009, “Deciphering the 2007~2008 Liquidity and Credit Crunc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3, No. 1: 77—100.
- [23] Caruana, J., 2010, “Macroprudential Policy: Working towards a New Consensus”, Remarks at the High—Level Meeting on “The Emerging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